

地緣與血緣的革命：方志敏與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的興衰

林威杰*

摘要

青年知識分子是推動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核心，他們受到新思想與愛國主義熱情的洗禮，將救國與改革社會的理念帶往家鄉，這樣的革命往往帶有濃厚的地緣與血緣色彩，這一點在贛東北尤為明顯。方志敏憑藉著本地人的身分，在此地建立起一套在地化革命模式，加上贛東北相對獨立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封閉」且又關鍵的交通樞紐，是中共革命中一種特殊的存在。這也是為何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在沒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下，能與國民政府周旋數年。方志敏在「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後遭國民政府處決，一種「烈士」的形象逐漸出現在世人面前。

關鍵詞：方志敏、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蘇維埃運動、「北上抗日先遣隊」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本文係江西省文化藝術科學規劃項目：「閩浙贛蘇區文藝史料的整理與研究」（2022BA0082）階段性成果。

一、前言

蘇維埃運動時期的中共武裝對農村的介入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降色彩，比如毛澤東（1893-1976）、朱德（1886-1976）、項英（1898-1941）等人並非江西人，卻在那裡造就了全國最大的根據地。中共中央蘇區發展與紅軍的軍事推動有直接關係，「黨的組織發展，是紅軍打來之後才發展的」。¹也就是說中央蘇區是先有紅軍，而後才有根據地；先有根據地，而後才有黨的組織發展。這就與贛東北的共產革命運動不同，在這裡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撐，而是由具有當地身分背景的知識分子將蘇維埃思想引入農村社會，再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親友關係、社會流動等人際網絡傳播開來的。方志敏（1899-1935）提到：「沒有紅軍，是可以組織和爆發一個群眾的暴動；但是在暴動之後，不積極去建立堅強能戰的紅軍，無論如何，暴動是不能長久堅持支持下去。」²因此，贛東北的共產革命運動是「先有黨組織，而後才有根據地；先有群眾武裝，而後才有正規紅軍。」³

Michael Dillon 認為位於贛東北邊緣的景德鎮在近代因為受到戰亂的影響，導致既有的瓷器貿易受阻，經濟的沒落以及勞資糾紛的日益升高，是中共能在此地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景德鎮不是一個大城市，是屬於一個中小型城鎮，從農村來的季節性勞務的工人，是構成這個地方重要的勞動力，他們將農村社會傳統觀念帶入這個城市。⁴為了獲得當地工人與勞工的支持，方志敏、邵式平（1900-1965）與黃道（1900-1939）等人憑借著贛東北本地人的身分，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將共產主義思想轉化成民眾聽得懂的語言，並以此將他們動員起來成為中共革命的基礎，同時又能不受限於地方傳統的去管理地方。⁵這種在地化的過程，

¹ 〈贛西南會議紀錄—關於組織問題〉（1930年10月13日），收入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628。

²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年3月），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48。

³ 方志純，〈方志敏與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紀念方志敏同志誕辰九十週年〉，《人民日報》（北京），1989年8月31日，第6版。

⁴ Michael Dillon, "Fang Zhimin, Jingdezhen and the Northeast Jiangxi Soviet: Traditio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in a Pottery Tow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6, no.2, (Jul, 1992), pp.587-588.

⁵ Stephen C. Averill 認為1927年以後，中共在江西的發展，有賴於當地社會菁英在農村的組織活動，這些地方運動往往是知識分子與農民聯合的成果。由於中共革命在城市的失敗，故漸漸開始將目光焦點轉向廣大的農村，利用根深蒂固的士紳階級和農民組織的傳統，透過宗教或血緣關係來聯繫群眾，而不是用艱澀難懂的馬克思主義口號，這是中共能立足於農村的

在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後，產生其向外的拓展性，讓共產革命運動不局限於贛東北，而是發展到其他省份，形成一塊涵蓋閩浙贛等省的廣大根據地。不過這種依靠地緣、血緣向外拓展的革命模式，較難在異鄉紮根，因此中共閩浙贛蘇區所能維持的時間並不長久。

中國大陸學者對蘇區的研究多半著重在中央蘇區，對於贛東北的關注較少。其中陳德軍從社會層面的視角切入，從地緣、血緣等多方角度剖析贛東北根據地的發展。⁶在方志敏的研究議題上，萬振凡與何爽認為自方志敏遭處決後，在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宣傳下，他的革命事跡得到一定程度的傳播。⁷楊奎松曾提到：「研究歷史人物不能忽視歷史背景」，尤其是在中共黨史人物的研究上，「過於偏重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認識和解读歷史，常常忽視了中共領袖人物乃至中共黨史，其實都不過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⁸因此，如何跳脫以往賦予方志敏的「烈士」形象，客觀評價他在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中的作用與影響，則成為研究者所必須思考的課題。

在臺灣學界，陳耀煌對區域共產革命發展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他認為鄂豫皖蘇區的發展，是共產黨與地方菁英之間，由「合作」到「控制」的過程。這些地方菁英出身的知識分子，加入中共並非僅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是多少帶有投機的意味。這些人返回故鄉到群眾中活動，大部分只是透過他們私人

重要因素。此外，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以江西安源為例，闡述革命者將傳統的權威轉化為新的政治目的，運用民間的節慶活動、祖先神明崇拜，以及秘密會社等模式，來組織群眾運動。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憑藉著地利之便，加上安源特殊的環境，更重要的是他們熟悉當地習俗，能夠與大部分勞工用方言交流，並無文化的隔閡。安源的群眾動員是中共革命史上重要的里程碑。Stephen C. Averill, “Party, Society, 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46, no.2, (May, 1987), p.299；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頁8。

⁶ 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⁷ 萬振凡、何爽，〈抗戰爆發前後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在國內外的傳播〉，《蘇區研究》，期4（2020年7月），頁23-32。

⁸ 楊奎松，〈研究歷史人物不能忽視歷史背景——對《周恩來傳（1898-1949）》若干史實的辯正〉，《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137。

關係，去拉攏其他社會菁英入黨。⁹

地緣與血緣是影響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發展的重要因素。方志敏等人如何運用當地人身分來從事革命活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本文將以國共雙方所載資料為中心，重構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及其蘇區發展史。內容主要從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探討：第一，方志敏對蘇維埃的認識如何？他如何將理念付諸實踐？贛東北蘇區如何發展？第二，方志敏等人在贛東北的經營，宛如是橫插在南京的一把利刃，嚴重威脅著國民政府統治的核心區域。那麼，國民政府在處理贛東北議題的態度為何？希望從這些問題來剖析方志敏在共產革命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以進一步豐富區域共產革命史的研究。

二、蘇維埃思想的引進與贛東北蘇區的創建

青年知識分子是中共在建黨之初的主要成員，這些人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進行政治宣傳，擴大中共的黨、團組織，所以黨員發展也多半集中在文化教育界，尤其是正在學校就讀的大學生、中學生和師範學生。¹⁰但在清黨後，中共轉入地下，深入到廣大的農村地區，這也讓黨員結構開始擴展到社會各個階級。

贛東北農民參與中共革命的類型主要有三：第一種類型是與共產黨知識分子之間存在著親緣、同學或相識等的社會關係；第二種類型是離開自己的村莊，以出去接頭的方式參與革命；第三種類型則是革命在一個地方立足和建立根據地後，經過來自根據地的革命分子的鼓勵與組織，參與進來，從而形成農民走進革命。¹¹方志敏曾就讀南昌工業學校，後又轉入九江南偉烈學校，這樣的學經歷在貧困的贛東北農村地區已經非常稀少。方志敏也說：「我還是多讀了幾年書，原因是

⁹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頁 455。

¹⁰ 1928 年 1 月 7 日，中共共青團負責人之一的吳振鵬的報告就提到：「江西是小農經濟社會，在北伐軍未入贛以前，黨的組織不過是一研究式的團體，純以感情結合多係知識分子……北伐軍到江西後，工農運動起來，但亦只做了些上層工作，當時工作的目標只在發展組織，只注意學生群眾，不到工農中去，一直到蔣介石叛變止都只做些上層工作。」吳振鵬，〈江西黨組織的發展與現狀〉（1928.1.7），收入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項不詳），頁 158。

¹¹ 參見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頁 80-104。

我的天資，比我的兄弟們都聰明一點。」¹²至於邵式平與黃道更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中共橫峰的地方黨員李穆就曾提到，當地農民「對讀書的人，都表示一種敬仰的心思。」¹³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純（1905-1993）也回憶說：「在這個時期，那些外出讀書的進步學生，走在前面，起了很重要的先鋒和橋梁作用。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¹⁴

對於江西的農民，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李烈鈞（1882-1946）是這樣形容：「贛民質樸，夙稱易治。」¹⁵農民對地租、借貸和賦役制度，多半視為天經地義，並沒設想要對這些制度有根本上的挑戰。雖渴望改善生活，卻不曉得在勤勞刻苦之外，還有什麼辦法來改變自己的命運。¹⁶「平債分田」更是「沒有前例可見」，就曾有人問方志敏：「欠財主老的債，會讓我們平了嗎？地主老的田，會讓我們分了嗎？靠得住做到嗎？」這種「犯法的」想法，更是他們不敢想像的。¹⁷如何改變農民逆來順受的性格，將他們組織動員起來，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蘇維埃三個字，有許多人不懂得」，甚至有人問方志敏：「蘇維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¹⁸在中共創黨之初的綱領就明確指出：「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並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但其實中共早期的幾位領導人對於革命路線有著不同的看法，不能否認的是「國際因素」是牽動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核心，「聯合第三國際」更深深刻印在每位共產黨人的心中。¹⁹然而，方志敏與毛澤東一樣，不像王明（1904-1974）、博古（1907-1946）、王稼祥（1906-1974）等人和莫斯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正是由於這樣的身分，方志敏不同於留蘇學生那般死背著來自莫斯科的教條，沒有條

¹²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3），《方志敏全集》，頁13。

¹³ 李穆，〈鄉間貧民之苦況〉，收入中共橫峰縣黨史工作辦公室編，《中共橫峰黨史資料》（上饒：中共上饒地委黨史辦公室，1991），頁360。

¹⁴ 方志純，〈贛東北革命鬥爭的回憶〉，收入方志敏、邵式平等著，《回憶閩浙皖贛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74。

¹⁵ 李烈鈞，〈與朱培德等致各報館電〉（1927.3.19），收入周元高、孟彭興、舒穎雲編，《李烈鈞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561。

¹⁶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194。

¹⁷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全集》，頁43。

¹⁸ 方志敏，〈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1935年6月19日），《方志敏全集》，頁195。

¹⁹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1991），頁3。

條框框的束縛，在革命實踐上有更靈活的方式。

在方志敏看來，蘇維埃政府就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政府」，他認為蘇維埃是維護底層民眾利益的政府，具有民族性、普世性和民粹性，是解放中國的利器。政權的建立是革命的重要核心，方志敏強調：「地主資產階級，手裡拿著一件最有力的武器，這就是政權！」²⁰方志敏對蘇維埃思想的認識和理解，一則是誘發他從事共產革命的動機；二則也可從中看出建立政權對中共革命和當地社會的影響。

三、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的在地化

中共在贛東北的發展，經歷一個由弋陽到信江，由信江到贛東北，由贛東北到閩浙贛的發展過程。方志敏對贛東北的蘇維埃工作做過這樣的說明：「九十萬工農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堅決不動搖的鬥爭，結果推翻了豪紳地主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創造了很大一片的蘇區。」贛東北蘇區是當時中共六大蘇區之一，是「中央蘇區一個有力的右翼」。²¹

贛東北多半指的是今天江西上饒、景德鎮、鷹潭。方志敏則活躍在上饒一帶，此地北臨懷玉山，南接武夷山，僅中間有狹窄盆地，信江貫穿其中。方志敏之所以能在此活動固然有各種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贛東北地形的易守難攻。這樣進退適宜的區位，讓國民政府很難對此地進行圍剿，而優越的戰略地位，又能成為中共中央蘇區聯結上海中央的必經道路，「贛東北匪區：由上海，杭州，灰州，屯溪，婺源而至匪區的路線，此路線是由滬至該匪區的主要路線，過去共匪物質上供給皆此路輸送」。²²方志敏就曾這樣說過：「弋陽九區一帶，不但地形很好，而且糧食也不缺乏，故能與白軍周旋幾年，不至失敗。」加上，「弋陽、橫峰兩縣，群眾基礎較好，又有磨盤山為依靠」。²³

²⁰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年3月），〈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1935.6.19.），《方志敏全集》，頁83、192。

²¹ 方志敏，〈在授予方志敏紅旗勳章儀式上致的答詞〉（1933年3月23日），《方志敏全集》，頁412。

²² 中統局編，《共黨交通工作技術及破壞方法》，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815/8231。

²³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年3月），《方志敏全集》，頁50。

江西是歷代中央政府統治力量及地方勢力相對薄弱的地區，贛東北更是「山高皇帝遠」，這就讓中共在此有發展的空間。²⁴1928年5月，中共在贛東北從事政治宣傳，當地政權「恐我們大舉繳其槍械，以前他們所張〔貼〕的反共標語，縣長下令取消了，他說：『共黨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厲害，到是不管得好。』」²⁵這顯然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剿共政策背道而馳，也或多或少說明為何在沒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下，方志敏等人能在贛東北進行活動。關於中共贛東北蘇區的發展，可以從黨的建設與教育文化兩個層面來看。

（一）黨的建設

在中國農民多半與土地伴隨而生，流動性不高，而中共的土地革命的確吸引不少底層農民的參加。對比農民的超穩定性，伴隨而來的是排外性。中國是地域遼闊的國家，各省份的方言與風俗民情有很大的差異，外地人很難打入農村。例如1928年6月，中共在福建發展就遇到這樣的問題：「中國農村，還是宗族社會的高牆築起，外來人如何能入農村，尤其是外省人，平空地實在無法可以入去。」外地人進入農村有兩大困難：「第一，人生路不熟，不能在農村常川〔長期〕地固定地作工作。第二，無法去找本地同志。」²⁶也因此，方志敏與中共江西省特派員饒漱石（1903-1975）曾制定《怎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當中就提到必須打破家庭、地方與宗族等觀念。²⁷

經濟因素是影響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早期中共領導人大都意識到倘若沒有土地的果實，很難實踐革命。「在革命前，農民的生產是為了地主資本家生產，生產出來的東西，都被地主、資本家收刮去了。在蘇維埃政權下，農民的生產是為了自己而生產，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歸自己所有。」²⁸方志敏善用社會的矛盾，

²⁴ 方志敏，〈信江黨和紅軍以及最近之局勢〉（1930年6月8日），《方志敏全集》，頁295。

²⁵ 〈江西工作近況—綜合性報告〉（1928年7月8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5。

²⁶ 〈福建工作中的問題及意見〉（1928年6月），收入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省委文件（1928年）》（內部資料，1984），頁298。

²⁷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年譜（1899-193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19。

²⁸ 方志敏，〈閩浙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全省選民工作報告書〉（1933年1月10日），《方志敏全集》，頁379。

以此獲得底層群眾的支持。根據方志敏妻子繆敏（1909-1977）對一次群眾集會的回憶：

志敏同志在會上問：「沒有錢用，欠了財主佬債的同志有幾個？請舉手！」三十四個人一齊舉起來。志敏同志又問：「自家沒有田種，向地主佬租田種，交租給地主佬有幾個？請舉手」大家又一齊舉起手來。他們嘈雜地說：「那一個不是窮的；不窮也不來革命了。」隨後，志敏同志又問：「大家贊成平債分田嗎？」大家一齊舉手，一邊齊聲喊道：「贊成啊！」又說：「這個還不贊成！？我們吃盡了他們的虧！」²⁹

方志敏嘗試將社會資源重新再分配，利用「歃血為盟」的方式來動員群眾，「在一村中，找幾個貧農邀集其餘貧農秘密在晚間組織，並舉行宣誓吃血酒的儀式，雖然這一儀式有點陷於封建的晚結拜方式的錯誤，但當時實收效果甚大」。³⁰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透過血緣親屬等關係與傳統社會產生共鳴，「我們是親密的與群眾聯繫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這樣的方式，「給了群眾許多實際利益——如平債分穀分財物等，消滅了一些為群眾深惡痛恨的豪紳地主，使群眾認識自己團結力量的偉大，革命的實際教育，已深入於群眾的腦中」。³¹「人們為著保護自己的鬥爭果實，每個村莊在自己村莊前後的高山上，每日都派出了人放哨。」當敵人要來圍剿時，這些老百姓更是「扶老攜幼牽牛挑擔的轉入深山」。對於在各地的黨員幹部，「群眾更是保護得無微不至」。當地政府要派人搜山，「事先群眾就會派人通知你」。³²這導致國軍在圍剿時，「人民消息最靈通，你殺到山前，他逃到山後，你殺到山左，他逃到山右，湊著機會帶紅軍來消滅你」。³³

方志敏透過給予這些底層群眾實際利益，來吸引他們參加中共革命，而土地的再分配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但這些中共口中的地主或中農階級，反倒成為打擊的主要目標。由於方志敏等贛東北中共領導人缺乏「階級包容性」，當底層

²⁹ 繆敏，〈弋橫暴動〉，《回憶閩浙皖贛蘇區》，頁 59。

³⁰ 〈中共信江特委關於信江群眾鬥爭的經過與蘇維埃的歷史〉（1930 年 7 月 1 日），收入江西省檔案館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 40。

³¹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 年 3 月），《方志敏全集》，頁 49-50。

³² 龍躍、江天輝、黃知真、繆敏集體漫談，黃知真執筆，〈漫談閩浙贛老根據地〉，《回憶閩浙皖贛蘇區》，頁 129。

³³ 樊崧甫，〈「龍頭」將軍沉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 87。

群眾主導贛東北農村社會後，所形成的社會動盪其實並不亞於「地主豪紳」時期的「壓榨」。這些地方仕紳除了飽受經濟的打擊外，更嚴重的是人身的危害，而他們多半也倒向國民政府一方，以確保自身安危和既有利益。因此，為了剿滅方志敏等人在贛東北的活動，國民政府在各地成立「靖衛團」、「懲共委員會」、「清鄉委員會」、「剿匪委員會」，並設立「靖衛團學生訓練班」，招收大批學生，加以訓練，以為日後幹部。由於國民黨在群眾工作方面相對薄弱，往往是透過當地仕紳來對廣大的農村地區進行統治，他們就成為這些組織的委員或主要負責人，再運用保甲維繫的地方武裝，來對中共進行打擊。例如在爭取民眾的問題上，根據當時負責貴溪防務的國軍七十九師師長樊崧甫（1894-1979）的回憶：

爭取民眾回家耕種：平原田地收復回來了，民眾跟紅軍上山，無人耕種，經濟上大為不利，治委會動員逃避後方的民眾回家。田分過了，有主的仍舊，無主的聽民眾耕種，誰種誰得。軍隊於城池碉堡築成後，派兵上山游擊，搶奪群眾回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律都要，回來後組成「宣傳隊」，宣傳他們「回來有工作、生活蠻好」，其實就是用武力威脅加上哄騙宣傳形成強制性的「反水」。³⁴

1928年7月，中共在一份關於江西的報告中便提到：「各縣土豪劣紳則為當地之主要人物，全省有靖衛軍一萬左右，槍械有六千左右，比較有力量的要算永修、吉安、撫州、鄱陽、弋陽、贛州、萬安、遂川、萬縣。這些武力，純在反動豪紳指揮下，作摧殘革命運動之用。」另一方面，當地政權在剿共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措施往往容易激起群眾們的不滿，反而將他們推向共產革命的行列中。如1928年在面對方志敏的弋陽暴動時，國民政府致使「農婦被奸擄的在一百以上，耕牛為官兵劫奪的□百七十餘頭以上，農村房屋被焚毀的在七百以上，九區的五千餘農民全變為流離失所的〔窮〕光蛋了。」這讓不少農民因此加入中共、參加紅軍，「現在變成窮光蛋了更好革命，免得顧慮家室妻子」。³⁵關於此點，根據樊崧甫的回憶：「貴溪為方志敏故鄉弋陽鄰縣，方對該縣民眾有很高聲望，該縣很富庶，民眾反水。」再者民眾「怕七十九師搶劫」，這導致樊崧甫對付中共紅軍的戰略，「以守城為主，夜間不敢出去，白天非師整旅不敢遠離，因此夜間是紅

³⁴ 樊崧甫，《「龍頭」將軍沉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83。

³⁵ 〈江西工作近況—綜合性報告〉（1928年7月8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1-2。

軍的天下，居民對白軍紀律深懷痛感」。³⁶

部分國民政府派駐當地的官員，「假剿匪為名，日以搜刮民財為能事」，「每至一處，奸淫擄掠，甚於赤匪；守城需費，佈防需費，出發需費，敲骨吸髓，無惡不作；鄉民怨毒之餘，相率投匪者有之，被迫自殺者有之，弋民不死於匪，即死於兵，其狀極慘」。³⁷這些地方仕紳中，許多人對國民黨缺乏信仰，他們假藉職權之便來為自身謀取利益，並非全然聽命於國民政府，這就使得剿共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歷來駐軍剿辦不力，壅上粉飾，養寇自重，遂致該股匪潛長滋蔓」。方志敏與邵式平等入往往也採取報復手段來回應國民政府的圍剿，例如 1930 年上饒縣城就曾遭到中共紅軍三次攻陷，「蓋上饒三遭匪陷，人民死徙一空，廬舍圯墟，田園荒蕪，焚殺之慘，罄竹難書，雖古黃巢闖獻之禍，無此逾此」，「信江河上，死屍數百具，浮沉蕩漾，與波上下。匪退數日，岸上及河中之屍，無敢掩埋，垠不見人，腥聞千里」。³⁸

自 1927 年清黨後，中共在江西的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國共分家後，反動的政治壓迫自然加甚」。直到 1928 年 7 月，中共在江西的黨組織才逐漸恢復，「最重要的贛西南區的組織反不如東北區、南潯區的開展，東北有九縣的組織、南潯區有三縣的組織，而西南的組織自遭摧殘以來竟寥寥無幾了」。以少先隊來說，江西全省共有千餘人，弋陽就佔了八百人。³⁹此後，受政權建立的支持和鼓舞，到了 1930 年 6 月，贛東北蘇區黨員發展到 6 千餘人，1931 年 5 月達到 12,431 人，11 月則有 12,725 人，1932 年 11 月發展到 17,375 人，其中農民佔總人數八成左右。⁴⁰基於這樣的背景，中共在贛東北黨員人數呈現穩定的增長，而同一時

³⁶ 樊崧甫，《「龍頭」將軍沉浮錄》，頁 80、84。

³⁷ 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赤匪禍贛實況〉（1931 年），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 25 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3），頁 109。

³⁸ 〈共匪三陷上饒記〉（1930 年），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一般 440/3.18（十二）。

³⁹ 〈江西工作近況—綜合性報告〉（1928 年 7 月 8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5。

⁴⁰ 〈中共信江特委的報告—信江黨和紅軍以及最近的局勢〉（1930 年 6 月 8 日）、〈贛東北省關於黨的最近工作狀況〉（1931.11.1），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18、401；〈贛東北來滬代表工作報告〉（1932.11.20），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 185。

段全國黨員的發展卻遇到較大的瓶頸。⁴¹如表 1 所示：

表 1：1931 年 5 月中共贛東北黨員人數與組織結構

項目 縣別	黨員 總數	職業										
		產業 工人	手工 業工 人	獨 立 勞 工	農民	苦力	船 工	士 兵	店 員	知 識 分 子	自 由 業	其 他
橫峰縣	1974	4	303		1647	2			6	8	2	2
弋陽縣	2469		276	41	2116	7	2	4	7	2		14
德興縣	2359		267		1729	36				9		318
上饒縣	2129		311	2	1674	60	20		4	8		50
貴溪縣	1645		306		1249	3			10	2		75
萬年縣	324	10	93		119					2		100
餘江縣	238		56		178			1				3
樂平縣	672	34	79		546	5			3	5		
紅十軍 ⁴²	621	18	196		316	5		14	29	43		
總數	12431	66	1887	43	9574	118	22	19	59	79	2	562

資料來源：〈贛東北黨的組織幹部黨員數量成份統計〉（1931 年 5 月），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230。

從表 1 也能看出弋陽、德興、上饒、橫峰與貴溪等地黨員人數佔比較高，這多半與方志敏、邵式平、黃道等領導人有密切關係。方志敏在 1923 年加入中共後，便積極的投入贛東北的農民運動。同樣的，另外幾位贛東北領導人，如邵式平、黃道也都回到家鄉發展黨支部。因此，清黨前中共在贛東北是有一定群眾基礎的，這才有後來方志敏所謂的「兩條半槍鬧革命」。中共在贛東北透過黨員發

⁴¹ 1930 年 9 月，中共在全國黨員人數為 122318 人，至 1931 年底則為 124617 人，漲幅僅為 1.88%，同一時期，贛東北蘇區黨員人數增幅達約 112.08%。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1921-1997）》，第 2 卷（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 68。

⁴² 1930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整合了贛東北武裝力量並將其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軍長周建屏，代理政治委員吳先民，由方志敏、胡庭銓、周建屏等人任紅十軍前委。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年譜》，頁 165-166。

展黨，團員發展團，群眾發展群眾團體，將秘密工作給予公開聯繫。挑選忠誠、積極、有辦法、有成績的幹部，扎根到基層群眾中。」⁴³樊崧甫亦有這樣的回憶：「信江以北為紅十軍團方志敏活動區域，兵有數萬，槍有數千，戰鬥力約當白軍一旅，但組織民眾極其嚴密，人樂為用。」⁴⁴

（二）教育文化

方志敏等贛東北中共領導人透過「宣傳」與「教育」的方式，來讓一般民眾瞭解與認識蘇維埃思想，以圖長期在贛東北立足發展。在當時「閩浙贛省文盲的數字還佔著全省人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這使得民眾在理解與認識蘇維埃上出現很大的阻礙，導致蘇區政府無法有效的推行政策或法令。⁴⁵在底層群眾的觀念裡，「認識自己的名字，記得來工匠帳就算了」，婦女更是「賠錢貨」，「所以她們沒有一個識字的」。⁴⁶有些農民加入中共、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會給他們吃的」，一些人甚至只是覺得「很時髦」。⁴⁷由於贛東北的大部分農民偏居於山區，這就容易與都市裡共產黨人的革命思想產生較大差距，對革命的認知也存在程度與時間的不平衡。⁴⁸為了扭轉這個現象，「當時蘇維埃的中心工作是教育群眾，實行民主，認識蘇維埃是自己的政權，發動群眾為自己的政權鬥爭的積極性」。⁴⁹方志敏提到：「一個革命的工農分子，要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文化水平，能夠閱讀蘇維埃一切的法令，及一切革命書籍報紙，加強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鬥爭經驗，必須讀書識字才能做得到。」⁵⁰

教育群眾首先得強化黨員幹部自身素質，中共在贛東北發展就面臨以下問題：「1、政治水平非常低落；2、同志對黨的認識薄弱；3、幹部很缺乏。」⁵¹因此，

⁴³ 邵式平等，《閩浙皖贛（贛東北）黨史》，收入《回憶閩浙皖贛蘇區》，頁23。

⁴⁴ 樊崧甫，《「龍頭」將軍沉浮錄》，頁78-80。

⁴⁵ 〈閩浙贛省蘇維埃文化部關於識字班的工作〉（1933年6月17日），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457。

⁴⁶ 方志敏，〈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1935.3），《方志敏全集》，頁13。

⁴⁷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 no.1, (Jan, 1995), pp. 60-61.

⁴⁸ 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頁42、43。

⁴⁹ 邵式平等，〈閩浙皖贛（贛東北）黨史〉，收入《回憶閩浙皖贛蘇區》，頁20-21。

⁵⁰ 方志敏，〈堅決與不求識字的文盲鬥爭！〉（1933年1月8日），收入《方志敏全集》，頁363。

⁵¹ 〈贛東北黨的組織幹部黨員數量成份統計〉（1931年5月），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230。

在黨員教育上成立共產主義學校，要求學員學習階級鬥爭、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白區工作、土地問題、青年工作、婚姻法等課程。方志敏更親自擔任課程主講，據當時學員陳直齋（1906-1981）回憶稱：「在學校裡，我學習了馬列主義概論，聽了方志敏等領導同志的講課，聯繫實際，進行思考，我的思想疙瘩才慢慢解開了。」在共產主義學校裡，「學習生活很緊張，每天早起要上軍事操和跑步。學員分三個班，每天聽課後就分班討論。晚上有時也開討論會，沒有燈，燃松光照明。白天討論時，有時在草坪上，有時在山上」。⁵²

為了「消滅蘇區內大多數文盲」，贛東北乃至後來的閩浙贛蘇區普遍在境內設置教育機構，推行免費教育，尤其是加強女子教育部分。⁵³據統計 1933 年上半年，閩浙贛蘇區全省列寧小學共 163 所，約 1 萬多人，工農補習夜校有 212 所，約 2 萬人，識字班人數更達到 4 萬多人，俱樂部 357 所，固定讀報者達到 10 萬人。⁵⁴一些學生更是自發性的參加社會活動，「如站崗放哨（站崗放哨兩個任務，一是查路條，二是掃盲，凡是過往行人一定要認讀識字牌上的字，否則不准通行）。有時還要到街頭去演講、演唱，宣傳黨的中心任務」。⁵⁵

1933 年 2 月 6 日，閩浙贛省宣傳部的決議案提到：「今後我們一定要用新的工作方式來做宣傳工作，不斷的想出新的方法來，如我們用木排或放詞燈，或者利用風箏來散髮標語等。總之要適合群眾的心理，使群眾不但不厭而且肯聽，更容易接受我們的宣傳。」⁵⁶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貼近他們生活，讓他們明白何謂蘇維埃是宣傳核心。為此，方志敏也透過民間藝術的方式，將贛東北傳統戲劇改編，「宣傳革命道理，啓發群眾的革命覺悟，與壓迫和剝削窮人的地主老財主作鬥爭」。⁵⁷他善用社會矛盾以此激化階級對立，並將這樣的現象寫成劇本，如

⁵² 徐大妹，〈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陳直齋，〈回憶在共產主義學校的學習生活〉，收入《回憶閩浙皖贛蘇區》，頁 389-391。

⁵³ 〈關於蘇維埃工作——中共贛東北特委擴大會議決議之三〉（1931 年 5 月 9 日），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186。

⁵⁴ 方志敏，〈閩浙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全省選民工作報告書〉（1933 年 1 月 10 日），《方志敏全集》，頁 385-386；〈閩浙贛省蘇維埃教育部關於七、八月兩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襲計劃〉（1933 年 6 月 24 日），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 451。

⁵⁵ 鄭秉裕，〈閩浙贛省屬模範區葛源的列寧小學〉，收入《回憶閩浙皖贛蘇區》，頁 400。

⁵⁶ 中共閩浙贛省宣傳部，〈各縣宣傳部長聯會決議案〉（1933 年 2 月 6 日），江西省檔案館藏，檔號：G001-2-400-002。

⁵⁷ 方志純，〈憶贛東北蘇區的戲劇活動〉，收入《閩浙贛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南昌：江

《年關鬥爭》便是反應 1929 年 6 月周坊暴動情形，演出時方志敏更親自扮演貧農團團長張三，來反映民眾們的訴求。⁵⁸「革命戲劇的興起，也使得贛東北地區的原來為數不多的專業劇團煥然一新。」⁵⁹方志敏曾自豪的稱：「贛東北群眾工作，我認為在全國蘇區中不是落後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可為模範，可為其他蘇區取效的。」⁶⁰

四、異鄉的發展與困境：從贛東北到閩浙贛

在方志敏的帶領下，贛東北蘇區的發展對國民政府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的調查顯示，截至 1932 年 8 月，由方志敏所領導的贛東北紅軍已達 12,000 餘人，同時配有步槍 2,000 支、手槍 130 把、機關槍 16 挺、木殼槍 120 支、破擊炮 6 門等，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⁶¹「江西匪巢之最大者，除井岡山外，厥為磨盤山。」⁶²在國民政府眼中贛東北的共產革命運動在當時是僅次於井岡山的威脅。方志敏以磨盤山為根基，在蘇區政權和武裝建設上都取得一定成效，並且憑借嫻熟的山地游擊戰，使國民政府承受不少壓力。

1932 年 11 月開始，方志敏帶領紅十軍「在鞏固東北蘇區的原則之下，將主力開過信江，由鉛山出擊，向撫州方向積極發展」，與中共中央紅軍相互呼應，希望藉此統合各地蘇區，由此「閩浙贛與中央蘇區打成一片的勝利開始了！」⁶³方志敏領導的共產革命運動由贛東北一隅逐漸擴展到閩浙兩省，成立了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目標是「省蘇政府全部的力量和經濟都用在組織與發展革命戰爭上」。⁶⁴然而，這樣的軍事行動卻造成鄰近省份的混亂與動盪，根據當時福建浦城百姓

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158。

⁵⁸ 方志敏，〈年關鬥爭〉，《方志敏全集》，頁 241-254。

⁵⁹ 方志純，〈憶贛東北蘇區的戲劇活動〉，收入《閩浙贛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頁 160。

⁶⁰ 方志敏，〈在獄致全體同志書〉（1935.4.20），收入《方志敏全集》，頁 110。

⁶¹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五處印發，《中國赤匪之現狀及匪軍實力調查表》（內部資料，1932），無頁碼。

⁶² 〈戴岳部進剿方志敏〉，《軍事雜誌》，第 22 期（南京，1930 年 4 月 1 日），頁 216。

⁶³ 〈中共贛東北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2.11.9），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155；〈中共閩浙贛省委緊急秘密通知（省字第一號）執行徹底打通閩北中央蘇區的緊急鬥爭任務〉（1933.1.4），收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257。

⁶⁴ 方志敏，〈閩浙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對全省選民工作報告書〉（1933 年 1 月 10 日），收入《方志敏全集》，頁 375。

的回憶提到：

憶自總角垂髻，略懂世事以來，家鄉浦城，即遭紅軍——方志敏部圍城三日；城破又遭洗劫三日；真是天陰地黑，風雲變色；鄉里望族，橫屍溝渠，滿目滄夷，慘不忍睹，我與二兄三兄三人，及避難我家的仙樓下黃家的一——黃瑞麟，他把金牙給拔掉，化裝成樵夫，混出城避難。⁶⁵

方志敏領導的共產革命運動帶有濃厚的地緣與血緣色彩，這是他能在贛東北立足的重要因素。但這樣的革命一旦離開原鄉，能否在外地發展就值得深思。方志敏雖將根據地擴展到福建、浙江一帶，但這樣的勝利或多或少是建立在紅軍的軍事佔領上，很難在群眾中扎根，流寇式的劫掠也給當地百姓造成巨大的傷害。這種依靠紅軍所建立的地盤，必須以強大的武力為根基，在此基礎上來發展群眾與建立黨組織，進而鞏固蘇維埃政權，中共中央蘇區便是顯著的例子。

但贛東北紅軍遠不如朱、毛紅軍那般強大，而且贛東北所處地理位置被國民政府視為核心地區，是連接閩浙皖贛等省的重要樞紐，對其圍剿的力度不亞於中央蘇區。中國大陸學者黃道炫認為，中央蘇區軍隊是基礎、政黨是靈魂、政權是手足。⁶⁶直至 1934 年時，中央蘇區已有顯著的發展，但在黨員群眾中仍存在著「閩贛省群眾壞，贛東北群眾好的觀點」，紅軍的主導地位讓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1990-1976）不得不承認：

我們已經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話，說我們應該反對依賴大紅軍的觀點，似乎大紅軍一走就什麼工作冒〔沒〕辦法的觀點。但是這種反對，只有當我們真正能組織群眾的武裝鬥爭時，才有意義，沒有大紅軍，又沒有群眾的武裝組織的依靠，而想在刀團匪擾的區域，建立一個空洞的蘇維埃機關，這種機關顯然經不起刀團匪的一次截擊就會完全坍塌的。⁶⁷

另外，同樣具有地緣與血緣色彩的陝北共產革命運動，領導人劉志丹（1903-1936）與方志敏同樣都是鄉村知識分子回到家鄉進行革命。但劉志丹從教育、軍

⁶⁵ 榴生，〈離鄉別祖五十年——鄉情報導之一〉，《浦城鄉親》（臺北），1993 年 5 月 21 日，第 2 版。

⁶⁶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頁 111。

⁶⁷ 張聞天，〈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4.7.26），《鬥爭》，第 71 號（瑞金，1934 年 9 月 7 日），頁 7。

隊系統（政府體制內）結合當地土匪發展組織，進而建立自己的武裝與根據地。劉志丹依靠自己在本地的人脈以及在哥老會的影響，將地方土匪吸納到自己的武裝中，這樣的模式也被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1942-）稱為「土匪與布爾什維克」。⁶⁸加上陝北並非蔣中正（1887-1975）的勢力範圍，更多的是與地方軍閥打交道。1927年10月13日，中共陝西省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就提到，當地軍閥的武裝「大都是無戰鬥力，無紀律的新兵」，且大部分「只顧保境自衛，剝削農民」，這就給中共在當地發展提供契機。⁶⁹方志敏則是從農村武裝暴動逐漸建立自己的根據地，而贛東北被國民政府視為核心地區，其地位並非是貧窮、偏遠的陝北所能比擬。

五、「北上抗日先遣隊」與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的受挫

1933年9月，國民政府展開了第五次圍剿，並採取碉堡戰術，全面封鎖中共根據地，這讓中共革命面臨極大的困境。1934年7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紅七軍團六千人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⁷⁰利用抗日口號，打擊國民政府後方，掩護中共中央紅軍的撤退，閩浙兩省則由方志敏、羅炳輝（1897-1946）兩部突圍，牽制國軍的追擊。⁷¹「北上抗日先遣隊」與方志敏的活動的確達到戰略目的，一定程度阻止國軍的圍剿策略。此時蔣中正擔心「羅匪必竄皖南，圖立新匪區」，如此「南京被脅」，他認為：「羅、方兩匪竄擾皖南，實力並不甚大。惟以各軍追剿不能統一指揮，故不易收聚殲之效。現該匪企圖合股造新赤區，若不速謀解決，滋蔓堪虞。」⁷²中共利用少數兵力成功吸引南京目光，為大部隊轉移爭取到寶貴的時間；另一方面，為更有效牽制國軍主力，11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紅七

⁶⁸ 劉志丹說過：「蘇區哥老會很多，他們大多講義氣，對我們有過不少幫助，並與我們有長期的關係。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發動群眾去清除，不會出面干涉。」劉志丹、習仲勳，〈陝甘邊根據地「十大政策」〉（1934.11），收入劉志丹，《劉志丹文集（1903~193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38；周錫瑞，《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122-136。

⁶⁹ 〈陝西省委給中央報告（第一號）—政治與黨務〉（1927.10.13），收入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5-1936）》（內部資料，1992），頁65。

⁷⁰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年譜》，頁310。

⁷¹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7冊（臺北：國史館，2007），頁592。

⁷² 「蔣中正致張學良電」（1934年9月17日），〈革命文獻—剿共：贛閩方面（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200-00020-058；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8冊（臺北：國史館，2007），頁262。

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組成新的「北上抗日先遣隊」。18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方志敏親率紅十軍團向皖浙一帶進軍，威脅京滬，以達到「動搖敵人的後方」，「動搖國民黨的整個軍隊」的目的。⁷³

為了化被動為主動，蔣中正派遣國軍第八十八師來圍堵方志敏部，嚴防戰火波及富庶的東南地區。此外，還用金錢來收買與分化，利用「子彈」、「銀彈」策略，以圖徹底消滅中共紅軍和蘇區，同時發出懸賞令：「生擒朱德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者獎勵10萬元，獻首者獎勵8萬元。生擒方志敏與邵式平等入者獎賞8萬，獻首者獎6萬。」⁷⁴1935年1月初，方志敏部與國軍展開激戰。此役導致方志敏「左臂受傷」，軍隊傷亡嚴重，以致「潰不成股，深夜經仙門青山、牛嶺方向逃竄」。⁷⁵國民政府又在被捕紅軍口中獲悉方志敏的轉移動向，稱：「方匪志敏率機槍兩連、偵探一連向南溪逃竄，行抵江園忽離隊，化裝潛逃。」⁷⁶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贛浙交界的懷玉山遭到浙江保安處長俞濟時（1904-1990）所統御之部隊捕獲。此消息立刻在各大報紙登載：「今晨七時半，會攻懷玉山，匪困守旬日，飢寒交迫。方志敏狼狽下山，圖逃於懷玉山附近程家灣與暖水之間，被我軍生擒。」⁷⁷方志敏的被捕，可謂是圍剿中共的重大戰績，當消息傳到蔣中正耳中，他便宣告浙贛邊區的紅軍被澈底消滅，「蓋竄擾浙贛皖閩四省邊境多年之方志敏股，近經浙贛軍圍剿後，完全瓦解。」⁷⁸「巨魁現既就擒，浙贛邊區剿匪大功完全告成矣。」⁷⁹這段圍剿方志敏的經歷，也成為日後國軍在戡亂戰爭中的重要參考。⁷⁹

⁷³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年譜》，頁310；方志敏，〈逃跑只是死路一條——在邊區群眾大會上的演說〉（1934年8月），收入《方志敏全集》，頁470。

⁷⁴ 「顧祝同呈蔣中正電」（1935年2月10日），《武裝叛國（七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098-073。

⁷⁵ 「劉鎮華呈蔣中正電」（1935年1月7日），〈武裝叛國（八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111-227。

⁷⁶ 「趙觀濤呈蔣中正電」（1935年1月2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三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60-031。

⁷⁷ 〈俞濟時生擒匪首方志敏〉（1935年1月29日），《通問報》，第4號（上海，1935年2月），頁20。

⁷⁸ 高明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9冊，頁186。

⁷⁹ 「俞濟時呈蔣中正電」（1946年8月1日）〈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五年（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09-004；俞濟時，《贛浙皖閩邊區——徹底剿滅方首志敏部（紅第七、第十軍團）紀實——從中國赤禍溯源說起》（臺北：國防部史政

1935年2月2日，方志敏、劉疇西（1897-1935）和王如痴（1903-1935）被押解到南昌，這讓蔣中正感到欣慰：「贛東北匪首方志敏、軍長劉疇西、王如痴皆先後被逮，師長尋維洲遭擊斃，其餘無一漏網。赤匪末路如此，乃惡貫滿盈之報也」。遂指示薛岳（1896-1998）：「請告前方將士以慰之。」⁸⁰方志敏等人在南昌遭到遊街示眾，「關在籠子裡的俘虜被安置在市中心的一個平臺上，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居民」。⁸¹國民黨借此「殺雞儆猴」，同時也是為了展現「勝利果實」，致使贛東北的共產革命運動遭受嚴重打擊。基於方志敏在中共黨內的重要地位及影響，賀衷寒（1899-1972）曾建議蔣中正「感化」這些被捕的中共黨人，以展現國民政府的「寬大政策」，報告稱：

匪首方志敏、劉疇西等被俘理應處決以快人心。惟值此川中剿匪軍事未告結束之際，為對於方（志敏）、劉（疇西）諸匪不加殺戮，則殘存各地掙扎生命之匪，必圖政府寬大之風，而作死處逢生之想，鬥志既散，瓦解自易。擬懇鈞座准將該匪等於審訓後暫予禁押，而對外則稱已送院感化，俾資宣傳，而利剿匪。⁸²

蔣中正希望勸降方志敏，以利未來制定剿共方針，便指示顧祝同（1893-1987）和熊式輝（1893-1974）等人必須詳加討論後再定。

另一方面，中共得知方志敏被捕後便開始極力營救。他在獄中仍能通過地下黨組織與外界取得聯繫，「方匪志敏被俘，尚有黨羽集資十餘萬元分赴南昌、南京等處活動免刑，聞該匪在獄尚能與外間通訊雲云」。⁸³方志敏將其獄中詩作、文

局，1982）。

⁸⁰ 「蔣中正致薛岳電」（1935年2月3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至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41-001；高明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9冊，頁256-258。

⁸¹ Reuter, "Communist leader in a cage Thousands greet capture of Fang Chih-mi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February 8, 1935, p. 13.

⁸² 「賀衷寒呈蔣中正電」（1935年2月10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06-094。

⁸³ 「賀忠寒呈蔣中正電」（1935年7月9日），〈陸海空勤各項情報（二）〉，《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71000-00002-007。根據1931年2月4日王明在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談話中便提到：「在龍華監獄（專為共產黨人設的軍事監獄）關押著500人，其中300-400人是我們的同志。他們在獄中成立了支部。」由此可知，當時共產黨人在獄中並非想像的遭遇各種非人道的對待，同時也並非完全與外界完全斷絕聯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紀錄〉（1931年2月4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7》，第10卷（北京：

章傳播於外，成為日後中共形塑他「烈士」形象的依據。但這些活動也引起南京當局的警惕，最終讓蔣中正決定處決方志敏。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秘密處死」。據顧祝同稱：「密前奉電，飭將方匪志敏秘密處死等回具，時以方匪自願筆述匪方為情，擬俟其脫稿再辦，仍時日已久延未交稿，歇系故意延宕，度怯惡不悛爰。於本月魚晨，遵令將方匪秘密處死。」⁸⁴

雖然方志敏遭到處決，但由於他長期在贛東北的經營，讓國民政府始終無法有效治理這個地區，直至1941年1月20日，顧祝同在給蔣中正電報中仍這樣提到：「閩浙贛三省邊區地形險峻，山嶽綿亘夙為共黨方志敏股盤據之所。抗戰以來還仍有不少異黨分子潛入其中，勾結當地土匪煽惑鄉愚，時出擾亂，當經由該省派隊圍剿，但彼剿此竄，始終未能肅清。」⁸⁵

六、 結語

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是中共能在此地立足的關鍵。蘇維埃思想的傳入，讓方志敏自認已經找到一條可以改造中國，創造新社會的渠道。他對馬克思、列寧思想有著自己的認識與理解，在實踐上也更加靈活。加上贛東北所處的特殊地理區位，讓中央政府觸角較難伸入。國民政府對於社會基層的掌握力相對薄弱，缺乏對社會的深度理解，更多的是透過對上層精英的吸納與統合，缺乏向下的深層扎根，與底層群眾產生很大隔閡。國民政府「在地化程度不高」是方志敏等職業革命家能在贛東北發展的原因之一。

贛東北共產革命運動是一場由內而外的革命，是一場透過地緣、血緣等人際網路，慢慢發展起來的革命運動，領導人的在地性，有助於革命的進展，最終讓整個根據地不僅僅局限於贛東北地區，而是拓展到福建、浙江乃至於安徽等地。不過方志敏等贛東北中共領導人缺乏階級包容性，「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固然受到底層群眾的歡迎，但這也將地主、仕紳階級推向國民黨一方，而這些地主、仕紳又選擇依附在國民政府體制下來打擊地方共產革命運動，以此維繫他們既有

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頁37。

⁸⁴ 「顧祝同呈蔣中正電」（1935年8月9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44-029。

⁸⁵ 「顧祝同呈蔣中正電」（1941年1月20日），〈增編（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221-060。

的利益。一來一回下，對贛東北農村社會造成不小傷害。而國民黨接手贛東北農村後，也無法獲得有效的管控，這樣的狀況直到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才慢慢有所改善。

徵引書目

一、文獻檔案

（一）檔案

1、臺北，國史館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三十三）〉。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八）〉。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四十六）〉。

〈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五年（六）〉。

〈革命文獻—剿共：贛閩方面（三）〉。

〈武裝叛國（八十八）〉。

〈增編（六）〉。

〈親批文件—民國二十四年二月至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國民政府》

〈陸海空勤各項情報（二）〉。

2、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一般檔案》

〈共匪三陷上饒記〉。

3、新北，法務部調查局藏

中統局編，《共黨交通工作技術及破壞方法》，檔號：276/815/8231。

4、南昌，江西省檔案館藏

中共閩浙贛省宣傳部，《各縣宣傳部長聯會決議案》（1933.2.6），檔號：G001-2-400-002。

（二）檔案、史料彙編

（中共）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編·省委文件（1928年）》，內部發行，1984。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1。

中共橫峰縣黨史工作辦公室編，《中共橫峰黨史資料》，上饒：中共上饒地委黨史辦公室，1991。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1921-1997）》，第2卷（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7》，第10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20。

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江西省檔案館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江西省、福建省、浙江省文化廳革命文化史料徵集工作委員會編，《閩浙贛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7冊，臺北：國史館，2007。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8冊，臺北：國史館，2007。

高明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9冊，臺北：國史館，2007。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五處印發，《中國赤匪之現狀及匪軍實力調查表》，編者發行，1932。

（三）雜誌、報紙

《人民日報》（北京），1989。

《軍事雜誌》（南京），1930。

《通問報》（上海），1935。

《浦城鄉親》（臺北），1993。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Shanghai, 1935.

（四）年譜、文集、回憶錄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方志敏、邵世平等著，《回憶閩浙皖贛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編，《方志敏年譜（1899-193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周元高、孟彭興、舒穎雲編，《李烈鈞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樊崧甫，《「龍頭」將軍沉浮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二、近人專書

周錫瑞，《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 俞濟時，《贛浙皖閩邊區——徹底剿滅方志敏部（紅第七、第十軍團）紀實——從中國赤禍溯源說起》，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82。
- 陳德軍，《鄉村社會中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修訂版。
-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 楊奎松，《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三、近人論文

- 萬振凡、何爽：〈抗戰爆發前後方志敏「抗日民族英雄」形象在國內外的傳播〉，《蘇區研究》，4，南昌，2020.7，頁 23-32。
-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 no.1, (Jan, 1995), pp. 45-76.
- Michael Dillon, "Fang Zhimin, Jingdezhen and the Northeast Jiangxi Soviet: Traditio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in a Pottery Tow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6, no.2, (Jul, 1992), pp.569-589..
- Stephen C. Averill, "Party, Society, 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vol.46, no.2, (May, 1987), pp.279-303.

Regional and Consanguineous Revolution: Fang Zhimi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east Jiangxi

Lin, Wei-Jie*

Abstract

Young intellectuals were the core force to promote the Chinese Soviet movement, who were cultivated by new ideas and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brought the idea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ocial reform to their hometown. Such revolution often had a strong regional and consanguineous feature, which wa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the northeast of Jiangxi. As a native, Fang Zhimin established a set of “unique revolutionary mode” here. In addition,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northeast Jiangxi made it a “closed” and critical transportation hub, which was a special presence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is was the exact reason why the Soviet movement in Northeast Jiangxi was able to contend against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for several years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 strong military force. Fang Zhimin was kill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advance troops of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to the north. Since then, the image of a martyr gradually appeared in fron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 Fang Zhimin , Northeast Jiangxi, Communist Revolution , Soviet Movement , "The North Marching Anti-Japanese Advance Troops"

* Instructor,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